

第3章 家庭支出与消费

张春泥* 涂平**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也发生在消费领域。一个曾经消费品相当匮乏、千篇一律、需要严格配给的社会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消费性商品从数量到种类到销售形式都日新月异的消费社会。在家庭消费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有研究证据表明中国家庭的消费重心逐渐从粮食向耐用品、住房、服务等方面转移(Chai, 1992),消费的目的从满足温饱迈向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Fan, 2002; Fleischer, 2007; Yin, 2005)。而增长和多样化只是中国消费领域变化的一个方面,变化的另一方面是消费的分化或差异性。以往对中国消费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城市人的消费(如 Cui & Liu, 2000; 2001; Schmitt, 1997; Zhou et al., 2010; 吴垠, 2005; CTR, 2012),这些研究最主要的发现是生活在发达地区的城市人或者是城市新兴的富裕阶层倾向于享受型消费,追求时尚和品位;消费的分化尤其体现在这些人与生活在欠发达地区或工薪阶层之间的悬殊差异,而后两者在消费上不活跃、趋于保守。对农村人消费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农村的商品市场欠发达,消费上的变化还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这一点在 Sun 和 Wu(2004)的研究中得到印证。他们发现农村人的消费需求层次低,对新潮产品的态度保守,与城市人的消费特征形成鲜明对比。上述研究描绘

* 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 涂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的是一个沿着家庭或地区收入分层、城乡分割为主线的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消费分层图景。然而当今中国在家庭收入和财富分层上已经产生了新的变化(Xie & Jin, 2015; Xie et al., 2015), 在人口流动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家庭的消费分层格局是否还是发达地区的城市家庭、少数城市新兴的富裕阶层引领享受型消费的前沿, 而大部分工薪阶层或农村家庭的消费仍处在消极保守的状态呢?

刻画家庭的消费特征并不容易。家庭消费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 消费水平的高低或花销金额的多少仅是其中一个方面, 不足以刻画家庭消费的全部特征, 消费的构成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而家庭消费多种多样, 不同家庭在不同的消费项目上也各有侧重。尽管家庭消费受限于家庭的收入和财富, 但决定消费的因素不仅仅是家庭经济资源的多寡, 消费作为认同表达和社会排斥的工具, 还受到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影响, 这反映为在拥有相近经济资源的情况下, 有的家庭侧重于某些项目的消费, 而另一些家庭侧重消费另一些项目。当然, 在更微观的层面上, 家庭消费的分化还可以体现为在消费同类项目上对不同档次或品牌的偏好。考虑到家庭消费在水平和构成上的分化, 我们在描述中国家庭的消费特征时要尝试将这两者相结合。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中, 我们曾基于 CFPS 2012 数据, 使用潜在分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ing)从家庭各类消费性支出的水平、各类消费品的拥有情况、支出的某些重要构成项目所占比重这三个维度中总结出五类各具特色的家庭消费类型。它们是享受型、稳妥型、蜗牛型、蚂蚁型和贫病型(张春泥、涂平, 2014)。在今年的报告中, 我们将继续沿用这一方法, 根据新一期的 CFPS 数据来检验这五种家庭消费类型划分的稳健性以及观测家庭在消费特征上的变化。

在本章接下来的报告中, 我们首先以 CFPS 2014 数据为基础, 必要时结合 CFPS 2010 和 2012 数据, 描述当前中国家庭包括消费性支出在内的支出水平及分化程度。其次, 我们将沿用往期报告中的做法, 划分并描述 2014 年的中国家庭消费类型, 并与这些家庭在 2012 年时的消费类型相比较, 描述家庭消费的变动及流动。



一、家庭支出水平、构成及分层概况

CFPS 2014 采集的家庭支出数据的问卷内容与 2012 年基本一致,但在个别项目的提问方式上有所改进,对一些支出项目进行了合并或拆解,以便受访者更好地回忆和回答。2014 年的家庭总支出包括四大类:(1) 居民消费支出,指的是家庭日常的衣食住行用的开销,这是家庭总支出的最主要内容(占 87%)。它具体包括八个子类: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日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消费性支出。(2) 转移性支出,包括家庭对非同住亲戚和朋友的经济支持、家庭的社会捐助,以及家庭重大事件中礼金或礼物的支出。(3) 保障性支出,包括家庭购买各类商业保险的支出。(4) 建房或购房的贷款。我们在附录表 A3-1 中汇总了四类支出涉及的具体项目。本报告分析的家庭支出正是这四大类合计的支出及其人均支出。

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 2014 年中国家庭支出的水平、构成和分化程度。分析所基于的样本是剔除分析变量缺失值后的全国再抽样样本。^①

2014 年全国家庭的总支出中位数为 38,200 元,人均支出的中位数为 10,016 元。其中,农村的总支出中位数为 29,360 元,人均支出为 7,298 元;城镇家庭总支出的中位数为 48,680 元,人均支出为 13,609 元,城镇家庭在总支出上的中位数是农村家庭的 1.7 倍,人均支出上为 1.9 倍(见表 3-1)。

表 3-1 2014 年全国及城乡家庭总支出、人均支出的平均数 (单位:元)

	总支出		人均支出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全国	55,296	38,200	14,498	10,016
农村	43,508	29,360	10,815	7,298
城镇	68,684	48,680	19,202	13,609
城乡比	1.58	1.66	1.78	1.86

注:全国 N=6,685;农村 N=3,555;城镇 N=3,130。如无特殊说明,样本量下同。

^① 考虑到缺失值带来的样本量损失,我们也曾在单个分析中使用最大非缺失样本(即允许每个分析的样本量不一致),分析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仍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



图 3-1 描述了 2010 年至 2014 年 CFPS 三期调查数据反映的城乡家庭人均支出中位数上的变化。我们看到,从 2010 年到 2014 年,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城乡家庭的人均支出水平均有所上升,但城镇家庭的人均支出水平在名义上的增长要快于农村家庭,名义支出的 4 年平均增长率在城镇为 8.0%,在农村为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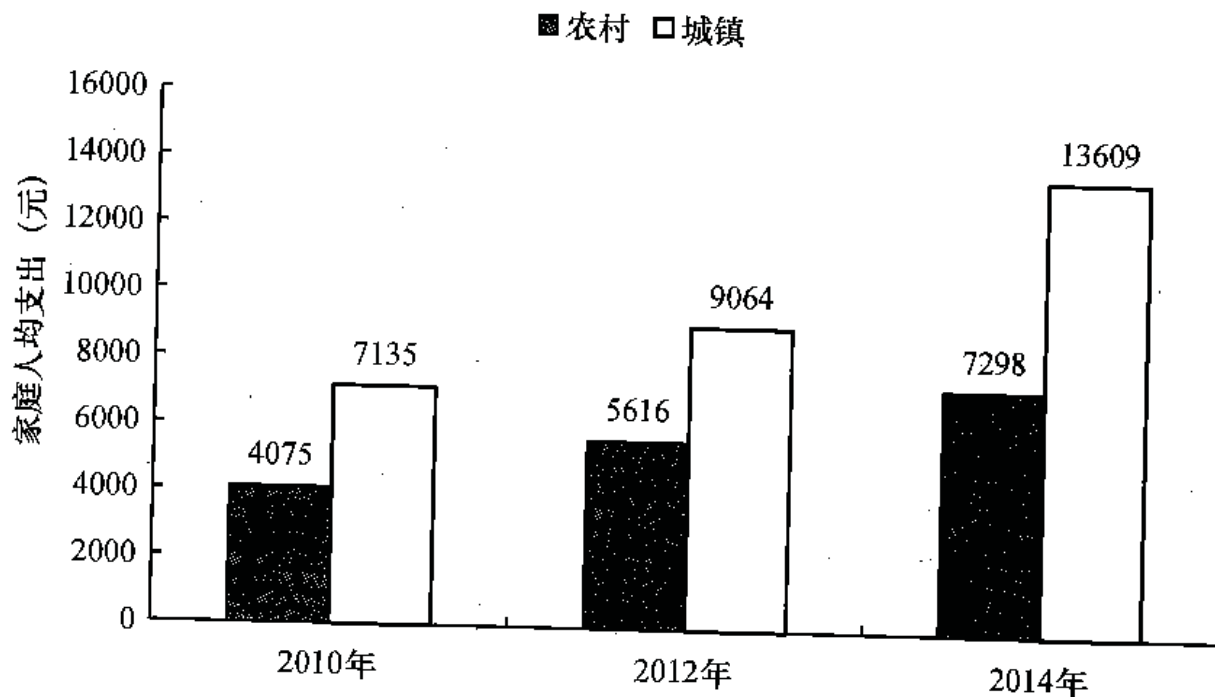


图 3-1 2010—2014 年分城乡家庭人均支出中位数(单位:元)

从支出的构成上看(见图 3-2),食品支出排在家庭总支出的首位,至少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其次是居住及房贷支出,两者共计占 17.2%;排在第三位的是转移性支出,包括给非同住的亲戚亲属和朋友的经济支持、社会捐助和人情往来支出。其余的支出项目按其占总支出的比重从高到低依次为家庭设备及日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及合并了衣着、保障性支出和其他消费性支出的其他支出项。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支出结构基本上一致,除了城镇家庭样本在食品、家庭设备及日用品的支出上稍高于农村家庭,而农村家庭样本在医疗保健、转移性支出上稍高于城镇家庭。但统计检验发现,总体中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各项支出比重上的差异均不显著。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城乡家庭在支出构成上基本一致。

尽管城乡家庭在支出的构成上已基本一致,但在分项支出的水平上却差别很大(见图 3-3)。城镇家庭在每一项支出上的均值都高于农村家庭,尤其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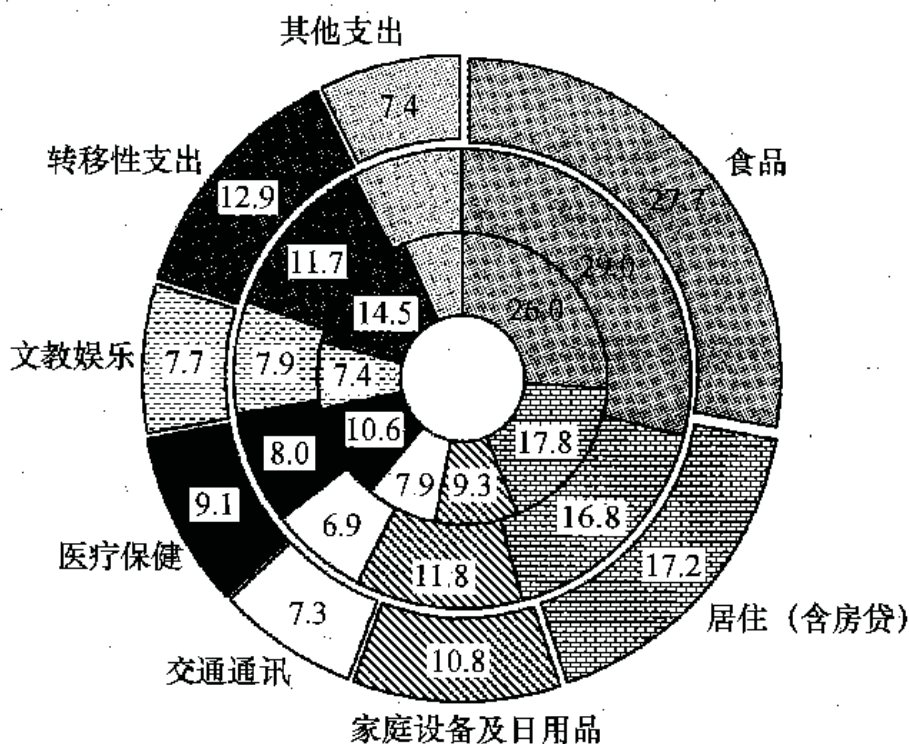


图 3-2 2014 年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家庭总支出构成(单位:%)

注:外环为全国;中环为城镇;内环为农村。

现在家庭设备及日用品(城乡比为 2.0)、食品(城乡比为 1.8)、文教娱乐(城乡比为 1.7)、居住及房贷(城乡比为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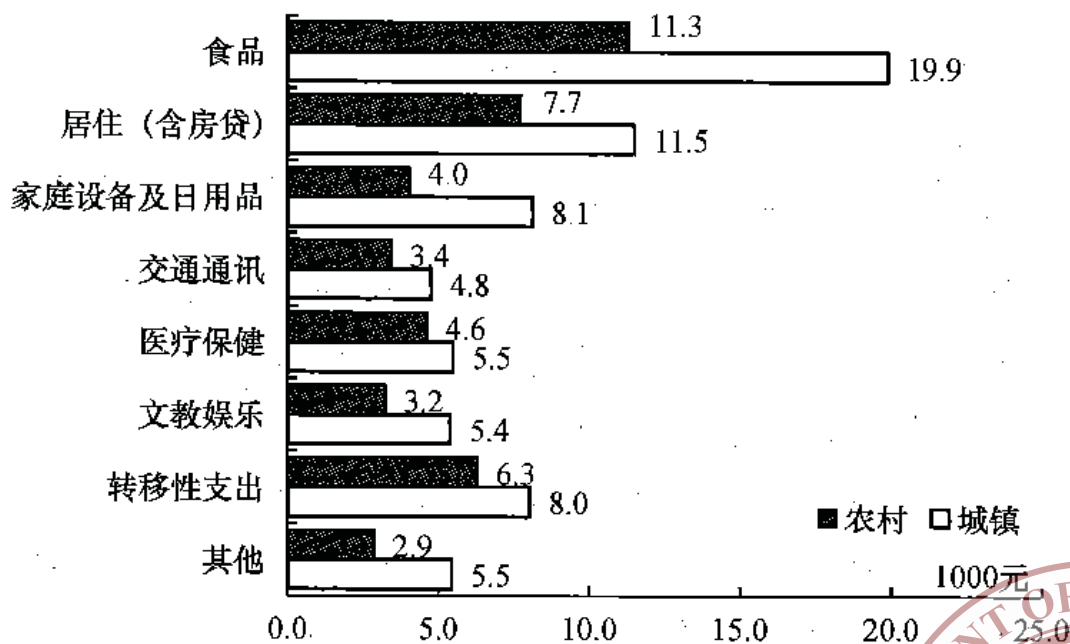


图 3-3 2014 年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主要分项支出均值(单位:千元)

支出结构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家庭在各项消费需求上的比重,我们看到,当今城镇和农村家庭在消费需求上已经相当接近,但是城镇家庭在满足各项消费需求上的支出水平均高于农村家庭,这既可能是由于城镇各项生活成本均



比农村高,也有可能是因为城镇家庭在同类需求中追求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

上述结果表明,城乡家庭在支出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支出水平和增长上:城镇家庭的支出水平明显较高、增长较快,这意味着家庭支出水平的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家庭支出的分化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还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之间。表 3-2 展示了用家庭人均支出计算的全国、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以及人均支出排在最高 10% 位置上和最低 10% 位置上家庭的支出比值,即 90/10 比值。两者均显示,家庭在支出上的分化程度低于收入上的分化程度。^① 全国的基尼系数和 90/10 比值要高于城镇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和 90/10 比值。这可以再次肯定之前的发现,即家庭之间的支出不平等有一部分是来自城乡差异。但是,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家庭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

表 3-2 2014 年全国、城乡家庭人均支出的基尼系数和 90/10 比值

	基尼系数	90/10 比值
全国	0.47	9.3
农村	0.45	8.2
城镇	0.45	7.8

注:基尼系数的计算使用家庭人数加权。

前面提到了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家庭支出的增长幅度在城乡间不平衡,其实支出增长的幅度在不同收入分层的家庭之间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为了反映变化的来源,我们比较了处在 2012 年各收入分位数分组上的家庭其 2014 年与 2012 年支出比值的中位数的变化。如果该比值高于 1,说明这些家庭两年间经历了支出增长,而低于 1 则说明两年间家庭的支出在绝对数上有所下降。从图 3-4 可以看出,所有收入分位数上的家庭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都经历了支出增长(比值均大于 1),但增长的幅度却不一致。从全国的情况上看,位于收入分组排名约 70%—80% 的中高收入家庭

^① CFPS 2014 收入不平等指标的计算结果请见本报告第 2 章“收入分配”。



的支出增长最快。但这掩盖了城乡内部支出增长趋势的差异：在城镇，支出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如排在收入分组最低 30% 的家庭），高收入家庭的支出增长幅度相对较低；而在农村，收入越高的家庭支出增长的幅度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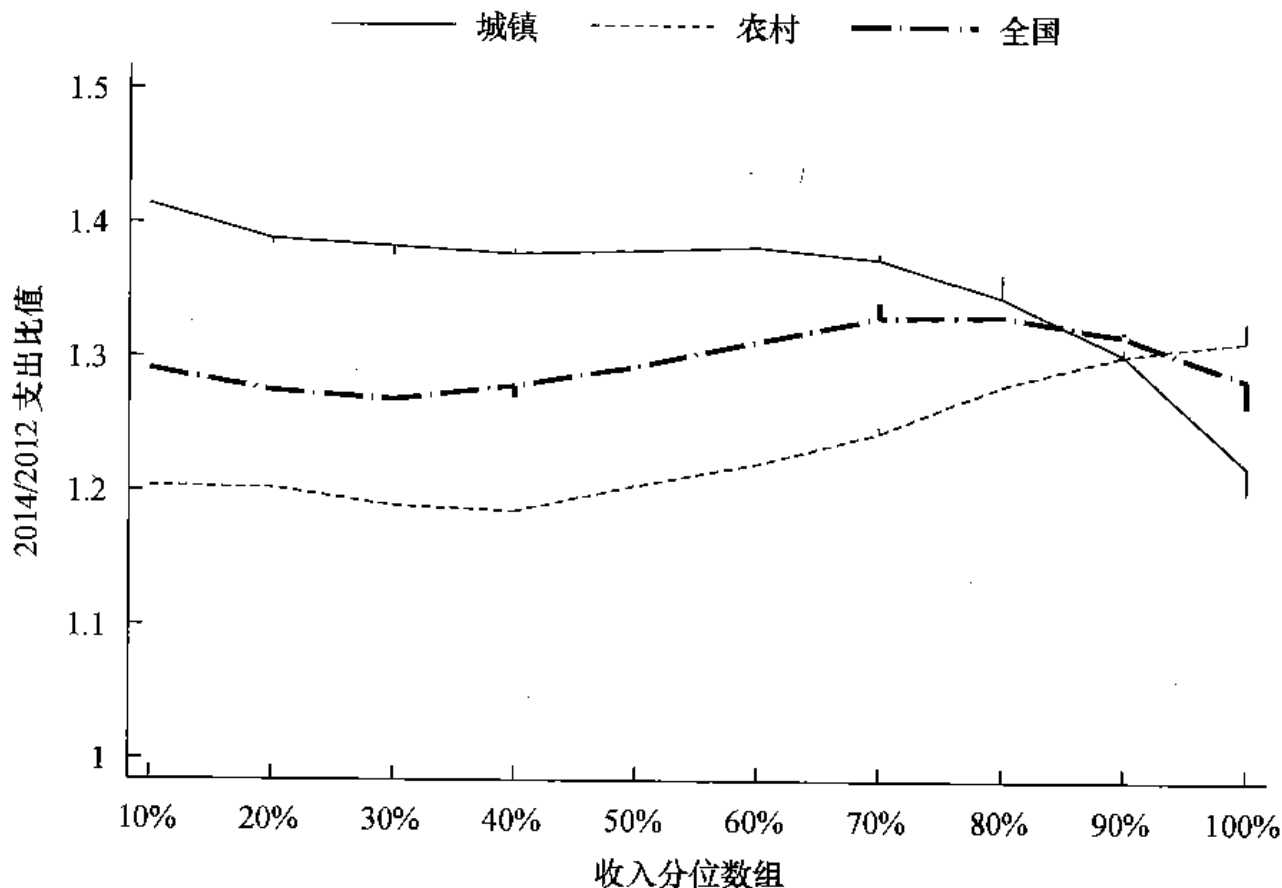


图 3-4 不同收入分位数的家庭 2014 年与 2012 年人均支出的比值 lowess 曲线

注：收入分位数是按家庭在 2012 年时的人均收入分组；城镇和农村也是按 2012 年的家庭居住地的城乡归属划分。

图 3-5 展示了各省人均 GDP 的对数与家庭支出增长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与图 3-4 中家庭收入地位与支出增长的关系相似，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家庭支出增长幅度较大，而农村家庭则是越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家庭支出增长幅度越大。

支出的增长与收入的增长不同，支出的增长一方面反映的是生活质量的上升、内需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生活成本的上升。为了了解支出的增长到底是生活质量的提升还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我们可以从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来考察：如果支出的上升仍伴随着收入的积累，则可以认为这种增加主要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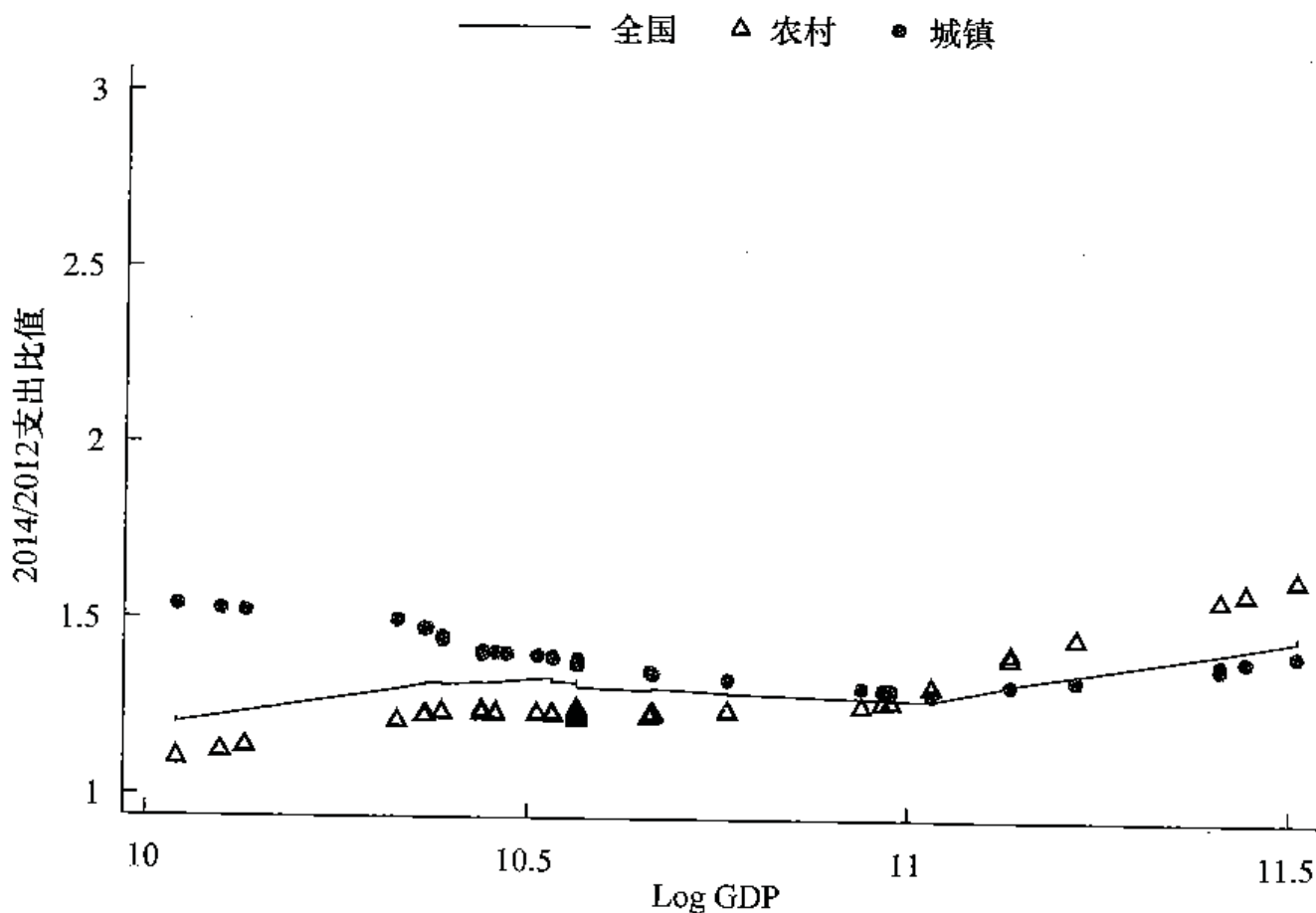


图 3-5 各省 2013 年 GDP 的自然对数与家庭 2014 年与 2012 年人均支出的比值

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反，如果是入不敷出，则意味着支出的上升可能给家庭带来负担。我们在图 3-6 中对收入处在不同位置的城乡家庭计算了其家庭总收入与总支出之比的中位数，如果该比值等于 1 则意味着收支大致相抵，大于 1 意味着积累，小于 1 则意味着入不敷出。我们以人均收入的四分位数将家庭划分为低收入（0%—25%）、中低收入（25%—50%）、中高收入（50%—75%）和高收入（75%—100%）四组。分析发现，尽管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水平均较之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低于支出，而中低收入家庭收支持平，几乎没有积累。相比之下，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在支出提高的同时还享有较高的收入积累。在此方面，农村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积累比例高于城镇。由此看来，低收入家庭名义支出的增长很可能是由于基本生活成本上升导致的，而高收入家庭名义支出的增加则反映了这些家庭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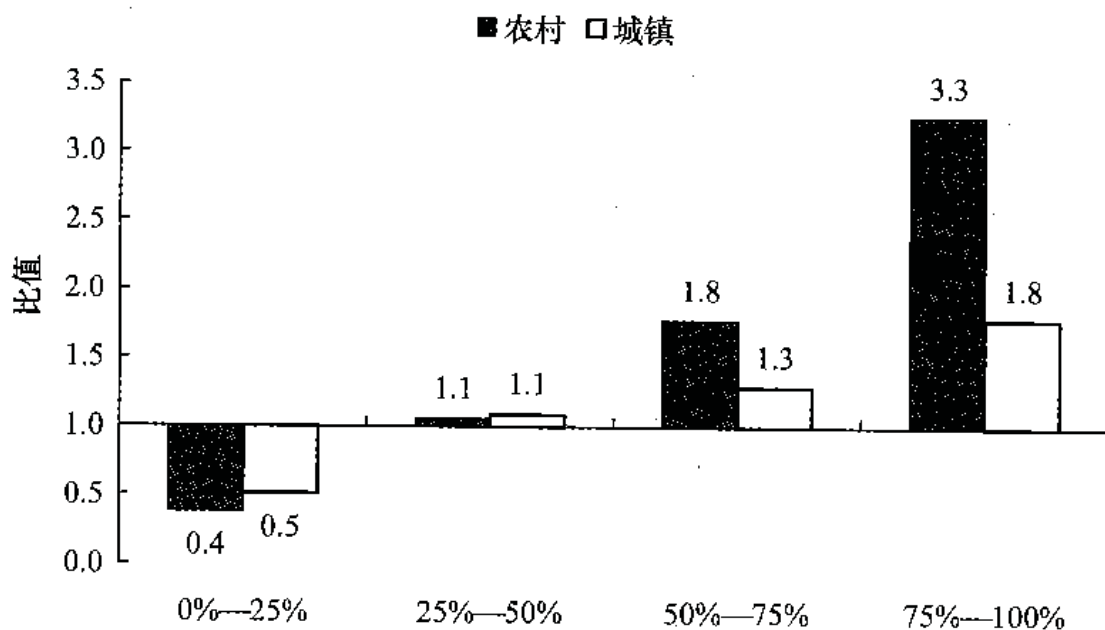


图 3-6 2014 年家庭人均收入各四分位数上的城乡家庭的总收入与总支出的比值

二、家庭消费类型

在 2014 年的报告中,我们曾根据 CFPS 2012 将家庭消费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享受型、稳妥型、蜗牛型、蚂蚁型和贫病型。这五类家庭各自的消费特点是:享受型家庭是享受着较高品质物质生活的家庭,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很高;其拥有各项耐用品、奢侈品的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支出水平也都很高,尤其是这类家庭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与此同时,这类家庭在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稳妥型是中等或中上消费水平的家庭,这类家庭在各项耐用品的拥有比例上仅次于享受型家庭,其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而且有一定的文娱支出。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这类家庭的总消费水平并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在汽车、文娱、艺术品或奢侈品方面进行消费,而是把家庭开支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上。住房、教育和医疗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蚂蚁型家庭是一类以低消费为特征的家庭,这类家庭的消费水平和耐用品的拥有比例均比较低,其在医疗支出、居住支出的比重也较低,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最后一类是贫病型家庭,这类家庭的消费水平和耐用品的拥有比例均非常低(贫),但其



医疗支出的比重却很高(病),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张春泥、涂平,2014)。

本章延续 2014 年报告的做法,用潜在分类模型的方法来区分 2014 年家庭消费的类型。在构造潜在分类模型中,我们仍使用与 2014 年报告相同维度的变量,具体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家庭是否拥有房产和各类家庭耐用品或奢侈品,其中耐用品包括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四种生活类家用电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手机)、五种文娱类家用电器(电视、电脑、组合音响、照相机、摄像机),及奢侈品(值钱家具、高档乐器、艺术品、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二是消费水平,包括总支出、日常基本支出(合并了食品、日用品支出、除房租房贷外的居住支出)、家庭耐用品支出、教育支出、文娱支出。其中,总支出、日常基本支出和家庭耐用品支出主要反映的是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而教育支出和文娱支出则反映家庭在文化、精神层次上的追求。三是消费结构,我们重点考察了医疗和房租房贷这两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这是因为医疗和住房是最影响中国家庭生活质量、消费和积累关系的因素。因病致贫、因房为奴是构成中国家庭最严重的两类经济负担。

基于 CFPS 2014 数据,潜在分类模型对家庭消费类型分类的结果与 2012 年的结果相当一致,同样找出了符合享受型、稳妥型、蜗牛型、蚂蚁型和贫病型特征的五类家庭,可见我们之前发现的家庭消费分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表 3-3 展示了 2014 年五种消费类型家庭在消费品拥有率、支出水平和个别单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均值,这里展示的支出项与我们在潜在分类模型中使用的变量一致。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家庭拥有房产的比例普遍很高,各类家庭拥有房产的比例均在 86% 以上。但在汽车的拥有上,仅享受型家庭中六成以上拥有汽车,其他四类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都较低。稳妥型家庭最普遍拥有的交通工具是电动车,蜗牛型和蚂蚁型则是摩托车。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基本上都有电冰箱和洗衣机,其四分之三有空调。蜗牛型和蚂蚁型家庭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比例在七到八成之间,与 2012 年相比有所提高(2012 年时为六到七成),但这两类拥有空调的比例较低。贫病型家庭对这些生活类家电的拥有比例都较低。无论是哪一类家庭,都普遍拥有电视机和手机,尽管如此,贫病型家庭对这两项的拥有比例仍低于其他各类家庭。除电视机外的文娱类家电的拥有情况较能反映出稳妥型、享乐型家庭与其他三类家庭的差异,

前两类家庭大多数都拥有电脑,并有相当多的家庭拥有组合音响、摄像机或照相机等,但后三类家庭拥有这些文娱类家电的比例都非常低。稳妥型和享受型家庭在耐用品拥有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奢侈品上,尽管所有类型的家庭在拥有高档乐器、值钱家具、艺术品和奢侈品上的比例均很低,但享受型家庭拥有这些贵重物品的比例仍明显高于稳妥型家庭及其他三类家庭。

表 3-3 2014 年各消费类型家庭的各项物品拥有率(%)和支出均值(元)

	贫病型	蚂蚁型	蜗牛型	稳妥型	享受型	总体
拥有率						
房产	86.7	90.7	90.4	88.6	90.8	89.9
汽车	0.7	4.7	10.8	17.3	59.4	16.7
电动车	21.8	37.6	25.6	63.0	50.8	39.6
摩托车	23.3	52.7	61.7	43.6	41.0	46.4
电冰箱	42.7	76.7	77.1	99.2	98.8	79.7
洗衣机	42.4	79.9	74.8	98.3	96.7	78.7
电视	90.9	96.1	95.7	98.0	98.8	95.9
电脑	2.6	19.0	21.5	78.6	89.8	39.9
组合音响	1.0	7.1	6.0	18.5	31.5	11.9
摄像机	0.0	0.2	0.1	4.4	12.6	2.9
照相机	0.5	1.3	0.8	20.4	49.3	12.3
空调	5.3	20.3	9.7	74.4	75.2	34.6
手机	79.8	94.0	95.8	98.5	99.4	93.7
值钱家具	0.7	2.6	3.4	8.6	15.1	5.4
高档乐器	0.0	0.2	0.1	1.8	3.4	1.0
艺术品、珠宝	1.8	4.2	3.5	22.6	46.1	13.7
支出均值						
总支出	13,090	22,831	64,980	53,610	140,836	55,296
基础生活支出	6,082	15,202	29,046	30,844	78,963	29,890
房租房贷	1,023	903	11,670	4,129	21,643	7,239
医疗	3,856	2,040	8,307	5,514	5,917	5,023
教育	499	1,733	5,292	3,263	6,615	3,410
文娱及旅游	9	106	249	696	3,955	837
样本量	1,074	1,726	1,525	1,316	1,044	6,685

图 3-7 展示了五种消费类型家庭的家庭总收入与总支出比值的中位数。



我们看到,对于蜗牛型和享受型家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人不敷出(比值小于1),其中蜗牛型家庭最为严重。尽管享受型家庭的总收入大于总支出的情况也很多,但这里可能存在高收入家庭对收入的低报,或者高收入家庭的支出相当一部分可能并非来自收入而是财产。相比之下,贫病型、蚂蚁型和稳妥型家庭都有一定的积累,尤其体现为蚂蚁型家庭的积累最多,可见我们将这类家庭比喻为“蚂蚁”非常贴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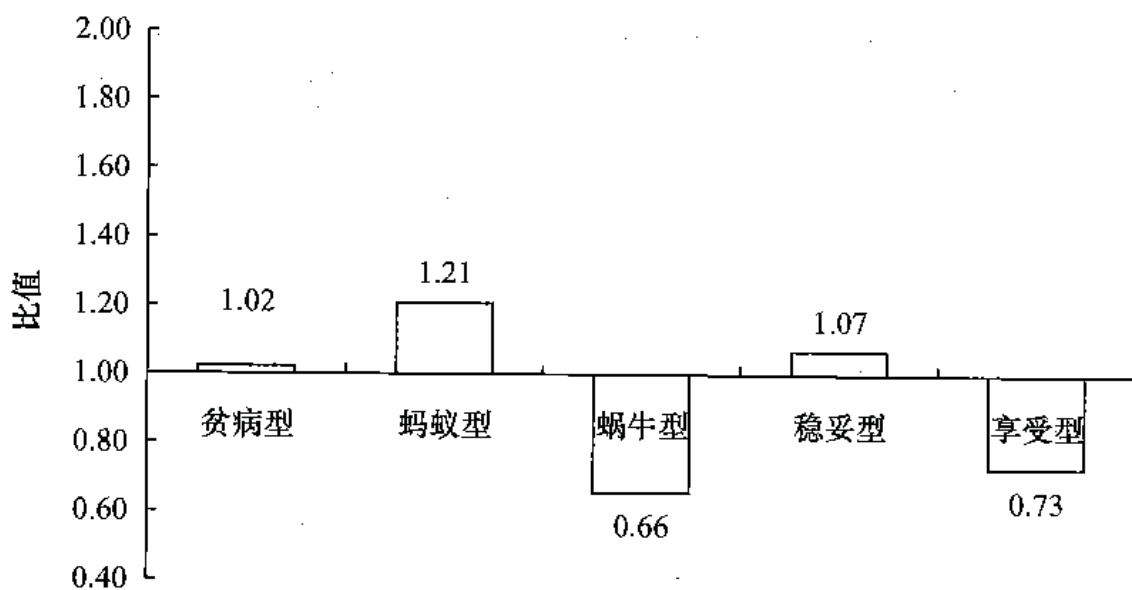


图 3-7 2014 年各消费类型家庭总收入与总支出比值的中位数

五种消费类型家庭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见图 3-8)。在城镇几乎是呈倒金字塔形,也就是享受型和稳妥型占一半以上,蜗牛型和蚂蚁型次之,合计约占 40%,只有 8%的贫病型家庭。而在农村,几乎是呈正金字塔形,享受型和稳妥型都非常少,两者合计不足五分之一,而蜗牛型、蚂蚁型和贫病型属于大多数,合计约占 80%。总之,城镇是以享受型、稳妥型家庭占多数,而农村是以蜗牛型、蚂蚁型、贫病型家庭占多数。这一分布与 2012 年的分布相近,不过有所改善的是,城镇和农村享受型家庭的比例较之 2012 年^①均有所增长。

接下来,我们将从截面变动和追踪流动两个角度来分别考察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家庭消费类型的变化。为了将两期调查的家庭消费情况在同一尺度上进行比较,我们在使用潜在分类模型时是将家庭在 2012 年和 2014 年的数据合并使用。

① 2012 年城镇享受型和稳妥型的比例分别为 23.1% 和 23.5%,农村为 7.8% 和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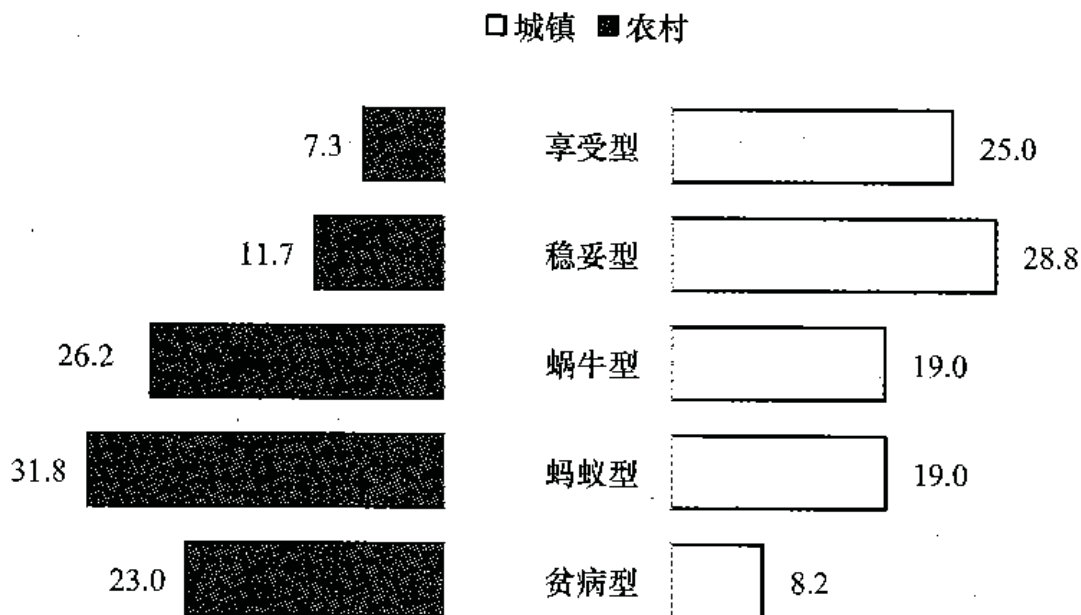


图 3-8 2014 年各消费类型家庭的城乡分布(单位:%)

图 3-9 展示了 2012 年和 2014 年各类型家庭的分布。与 2012 年相比, 2014 年享受型、稳妥型、蜗牛型家庭所占比例都有明显的增加, 而蚂蚁型和贫病型的占比减少, 其中以享受型的增加和蚂蚁型的减少尤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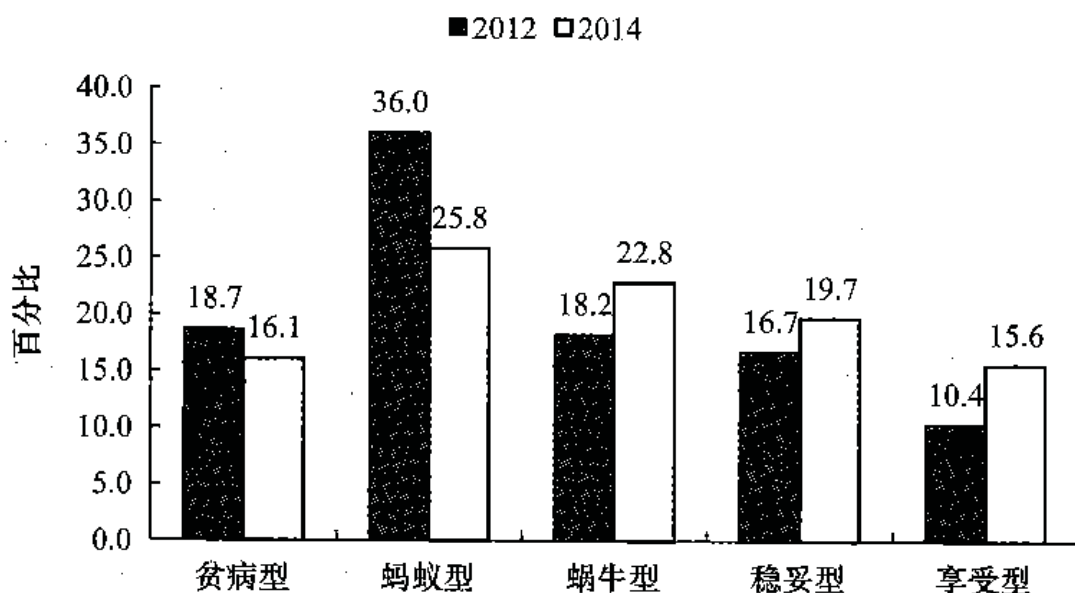


图 3-9 2012 年和 2014 年各类型家庭的比例(单位:%)

与截面数据的描述相比, 追踪数据更能体现出家庭在不同年份实际经历的消费类型流动。我们以同一批追踪家庭在 2012 年和 2014 年两期调查中所属的消费类型做交互表, 以 2012 年为起始状态、以 2014 年为到达状态计算单元格百分比, 并假定家庭从贫病型依次往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享受型发展为向上流动, 反之为向下流动, 基于此计算出的向上流动比例为 37%, 向下流



动比例为 18%。表 3-4 是以 2012 年家庭各消费类型作为基数计算的流出比例,其表示 2012 年某一类型的家庭有多大比例在 2014 年流动到其他类别上。我们看到,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家庭流动到其他状态上较之贫病型、享受型的流动比例更高,而其中尤以蚂蚁型向上流出的比例较高,蜗牛型向下流出的比例较高。享受型的流出是相对最少的。

表 3-4 2012—2014 年追踪家庭消费类型的流动:流出百分比 (单位:%)

2012 年	2014 年					合计	样本量
	贫病型	蚂蚁型	蜗牛型	稳妥型	享受型		
贫病型	50.5	28.7	15.3	3.9	1.6	100.0	991
蚂蚁型	13.7	36.9	27.2	17.8	4.5	100.0	1,948
蜗牛型	6.4	29.4	42.2	15.0	7.0	100.0	953
稳妥型	1.0	9.5	8.6	48.4	32.6	100.0	937
享受型	0.6	4.7	8.0	20.1	66.5	100.0	487

注:表 3-4 的分析是基于同时接受了 2012 年和 2014 年家庭经济问卷访问的追踪家庭样本,因此分析样本量有所减少。

最后,我们来看各消费类型家庭具有怎样的特征。表 3-5 显示,大部分稳妥型、享受型家庭居住在城镇,其家庭人口规模和少儿人口数均在这五类家庭中处于中等水平,家庭老龄人口数较少,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其中,享受型家庭的 16 岁及以上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和财产都明显高于稳妥型家庭。相比之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的家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家庭 16 岁及以上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和财产均明显低于稳妥型和享受型家庭。其中,贫病型家庭的家庭人口特点之一是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较老,体现为这类家庭中老龄成员人数最多,而少儿人数最少。贫病型家庭的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家庭外出人口数和人均收入均较少、家庭财产最少。蜗牛型和蚂蚁型家庭在财产上相差无异,^①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成员教育受年限上是蜗牛型略高。而这两类家庭在家庭人口特征上的差异较

① 蚂蚁型和蜗牛型在家庭财产上的 T 检验结果: $t = -0.0966, Pr(|T| > |t|) = 0.9231$ 。

明显:蜗牛型家庭的少儿和老年人的人数均显著较多,家庭平均规模显著较大,^①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这类家庭为何在居住、教育和医疗上的支出水平和比例较高。分城乡描述各消费类型家庭的基本人口及社会特征的结果与全国描述的结论基本一致。

表 3-5 2014 年各消费类型家庭的基本人口及社会特征

	贫病型	蚂蚁型	蜗牛型	稳妥型	享受型
全国					
居住城镇(%)	23.7	34.5	39.0	68.5	75.0
家庭规模(人)	2.7	3.7	4.3	4.0	4.2
15岁及以下少儿人数(人)	0.3	0.7	0.9	0.8	0.8
65岁及以上老龄人数(人)	0.8	0.4	0.5	0.4	0.4
家庭外出人数(人)	0.3	0.4	0.4	0.2	0.1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4.3	6.3	7.0	9.0	10.3
2014年家庭人均收入(元)	11,724	10,743	12,952	17,881	28,221
2012年家庭财产(万元)	9.6	19.7	19.8	37.6	75.2
农村					
家庭规模(人)	2.8	4.0	4.6	4.6	5.0
15岁及以下少儿人数(人)	0.4	0.9	1.1	1.0	1.1
65岁及以上老龄人数(人)	0.8	0.4	0.4	0.3	0.4
家庭外出人数(人)	0.4	0.4	0.5	0.3	0.2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4.1	5.8	6.4	8.0	8.4
2014年家庭人均收入(元)	82,77	10,035	12,163	16,930	20,650
2012年家庭财产(万元)	8.4	16.4	17.5	32.8	52.5
城镇					
家庭规模(人)	2.3	3.3	3.8	3.7	3.9
15岁及以下少儿人数(人)	0.2	0.5	0.7	0.7	0.7
65岁及以上老龄人数(人)	0.7	0.5	0.5	0.4	0.3
家庭外出人数(人)	0.2	0.2	0.3	0.1	0.1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5.0	7.3	7.8	9.4	11.0
2014年家庭人均收入(元)	22,794	12,085	14,189	18,317	30,745
2012年家庭财产(万元)	13.4	26.1	23.4	40.0	83.0

① 蚂蚁型和蜗牛型在少儿人数差异的单尾 T 检验结果: $t=-5.4210, Pr(T<t)=0.0000$; 老龄人数差异的单尾 T 检验结果: $t=-1.3559, Pr(T<t)=0.0876$ (0.1 水平上显著); 家庭规模差异的单尾 T 检验结果: $t=-11.2191, Pr(T<t)=0.0000$ 。



从表 3-5 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各类型家庭在家庭财产上的梯度似乎要比在家庭收入上的梯度更明显。在家庭收入上,贫病型的家庭收入与蚂蚁型家庭没有显著差异,^①也与蜗牛型家庭没有显著差异,^②在家庭财产上却明显不及这两类家庭。另外一个梯度明显的区别是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从贫病型到享受型,下一个类别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显著比上一个类别高。但是上述观察受到变量测量单位的干扰,也没有考虑家庭财产、家庭收入和家庭成员文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将这三个因素所对应的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并使用了 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在多元统计控制的条件下来看这三个因素对家庭成为某一类别而不是贫病型的可能性,以优势比(odds ratio)来表示当家庭收入、财产或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个标准差,这个(些)家庭成为某个类别的可能性是其成为贫病型的多少倍。图 3-10 展示了在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城乡居住地后这三个因素的优势比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三个因素中,家庭财产的效应最大,次之为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再次才是家庭收入。这一发现表明,家庭收入只是影响家庭消费类型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经济因素,而家庭财产和家庭文化的影响也许更重要。

此外,我们从图 3-10 中还能看出,家庭财产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庭成为享受型的可能性。这说明虽然图 3-7 显示享受型家庭的收入少于支出,但这类家庭并非存在“入不敷出”的经济困难,也许只是表明收入不足以刻画这类家庭的经济实力,或者这类家庭存在超前消费。这也佐证了我们将这类家庭命名为“享受型”的恰当性。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类型是蜗牛型。我们看到财产对家庭成为蜗牛型的效应不及其对家庭成为蚂蚁型的效应,而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却对成为蜗牛型的影响更大。由于蜗牛型和蚂蚁型家庭主要分布在农村,蜗牛型更体现出家庭的收入流量增加和文化层次提高对更高消费的影响,比如需要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入、对住房条件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健康有更多的投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因此也导致这些家庭积累较少,背负更多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支出压力。

① 贫病型和蚂蚁型的家庭收入差异的双尾 T 检验结果: $t=0.4143, Pr(|T|>|t|)=0.6786$ 。

② 贫病型和蜗牛型的家庭收入差异的双尾 T 检验结果: $t=-0.3287, Pr(|T|>|t|)=0.74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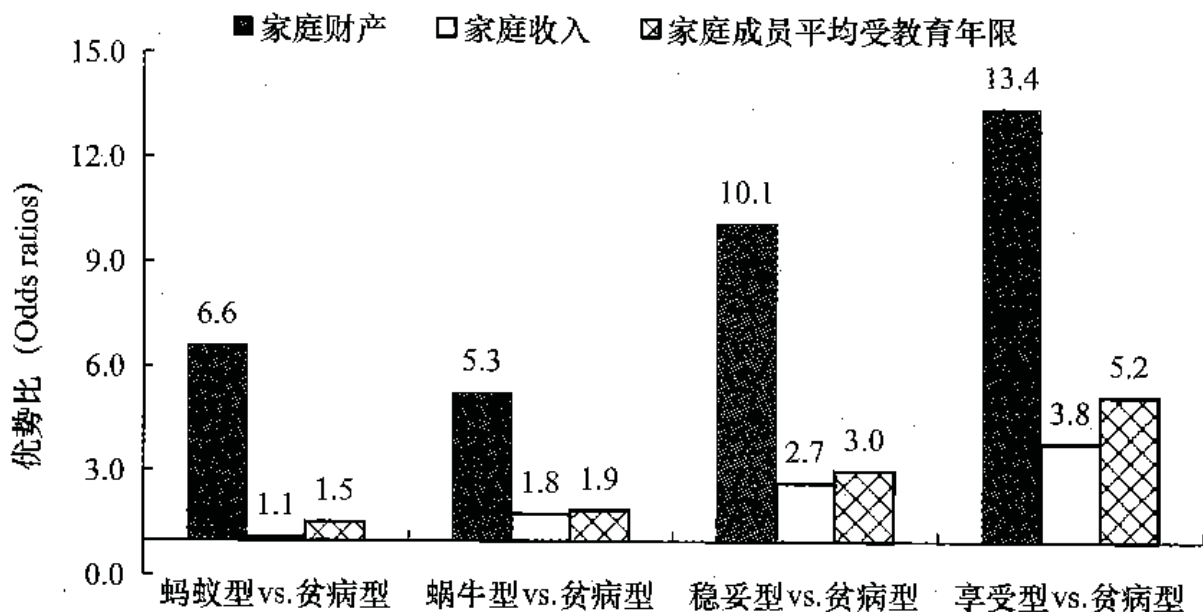


图 3-10 家庭财产、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家庭成为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享受型(均以成为贫病型为参照)的优势比(odds ratio)效应

注:优势比的估计基于 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因变量为家庭消费类型,以贫病型为基准类。控制的自变量包括家庭规模、15 岁以下少儿人数、65 岁及以上老龄人数、城乡居住地。家庭财产、家庭收入和家庭成员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做了标准化。

三、本章小结

基于 CFPS 2014 家庭支出数据的分析,以及与 CFPS 2012 年数据的比较,本章的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1. 2014 年,全国家庭的总支出中位数为 38,200 元,人均支出的中位数为 10,016 元。城镇的家庭支出水平高于农村,城乡家庭总支出中位数的差距为 1.7 倍,人均支出上约 1.9 倍。

2. 从支出的构成和分项水平上看,当今城镇和农村家庭在消费需求上已经相当接近,但是城镇家庭在满足各项消费需求上的支出水平却明显高于农村家庭。

3. 在支出的增长上,城乡各收入阶层的家庭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均经历了支出增长,但增长幅度存在城乡及收入阶层的差异。总的来讲,城镇的支出增长幅度高于农村。全国水平上看,似乎是中高收入阶层的支出增长幅度最大,但这实际上是农村和城镇不同的支出增长模式相混合造成的:在农村,高



收入家庭支出增长幅度较大,而城镇是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增长幅度较大。

4. 家庭支出的增长既可能反映的是生活成本的上升,也可能反映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将家庭支出与收入相比较的分析显示,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有相当比例的收入积累,其支出的增长更可能反映为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低收入家庭存在入不敷出的情况,其支出的增长可能是由于生活成本的上升所致。

5. 2014年的家庭消费类型仍然可以划分为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受型。其中,享受型家庭享有较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稳妥型家庭的消费仅次于享受型家庭;蜗牛型家庭的总消费水平较高,但是这类家庭在医疗、居住和教育上的支出负担较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提高生活品质上的消费;蚂蚁型家庭是以低消费、多积累为特征,这类家庭在各项支出和消费品拥有上都较低;贫病型家庭是以贫病交加为特征,一方面是这类家庭在消费品上极为匮乏、支出水平低,另一方面是这类家庭的医疗开支比重很高。

6. 在消费类型的城乡分布上,城镇是以稳妥型和享受型家庭为主,两者几乎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农村是以贫病型、蚂蚁型和蜗牛型为主,约有八成的家庭是属于这三种类型。

7. 从2012年到2014年,稳妥型、享受型的家庭比例均有所增长,相对应的是贫病型家庭比例的下降。发生消费类型向上流动的家庭多于发生向下流动的家庭,尤其是蚂蚁型家庭向上流动的比例高。

8. 家庭收入并非是影响家庭消费类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因素,家庭消费类型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人口构成、家庭财产水平和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的影响。与贫病型、蚂蚁型和蜗牛型相比,稳妥型和享受型家庭在收入水平、财产水平和文化水平上都明显处在更高的地位。贫病型家庭中的老龄人较多,这类家庭的经济匮乏不仅体现在消费上,也体现在财产和收入上。蚂蚁型和蜗牛型的差异一方面体现在家庭人口上,蜗牛型家庭的规模较大,老龄和少儿人数均较多,这是其消费负担的一个来源;另一方面,蜗牛型家庭的收入流量相对较多,外出打工人数相对较多,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这一类家庭对消费可能存在更高的需求。

本章描述了2014年中国家庭消费分层和变化的概况,并利用统计模型概

括出五类典型的家庭消费类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庭的消费分化已经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尽管以往研究提到的城乡分化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分化的形式不再体现在消费构成上,而是消费水平上。换言之,农村家庭在消费需求结构上已经相当接近城镇家庭,但在消费水平上明显低于城镇家庭,这既可能是由于城市人在同样的消费需求上追求更高的品质,也可能是由于在城市满足同等消费需求的成本比农村高。从消费类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以消费水平为基础的城乡分化。城镇家庭有一半以上是稳妥型和享受型,而农村家庭八成左右都是蜗牛型、蚂蚁型和贫病型。这些消费类型的城乡分布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率上的差异。

家庭消费的变化其次体现在近年来家庭支出水平普遍的、持续的增长,但增长幅度最大的群体是城镇的低收入家庭和农村的高收入家庭。由于绝大多数的支出都来自消费,这说明消费的增长已经从城市的富裕阶层扩展到原来消费水平较低的群体——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但从支出与收入对比的角度上推断,城镇底层支出水平的增长很可能是来自生活成本的上升,而农村高收入家庭支出的增长更可能反映出内需的扩大,这一推断也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变化的研究证据相符(Xie et al., 2015)。家庭消费类型的变化较为乐观。两年间贫病型和蚂蚁型家庭的比例在降低,稳妥型和享受型家庭的比例上升,从追踪数据也可以观测到确实有更多的家庭在两年间转变为稳妥型和享受型。由于家庭消费类型既考虑了支出水平,还考虑了消费品的拥有情况和支出的内容,因此这一变化能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家庭在物质和文化消费上的提升。

我们对两期 CFPS 数据的独立分析均发现了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受型这五种家庭消费类型,这五种类型本身就不仅反映出中国家庭在消费模式上的多元化、保守与超前相混合,也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蚂蚁型和稳妥型可能最能体现过去中国家庭的消费特征,如支出上节俭、重视积累、稳重消费。这两类家庭仍然在中国有相当高的比例(约 45%),但比重上显然已经不是绝对的主导。享受型的出现和增长说明越来越多的城镇家庭和农村富裕家庭追求更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并丰富精神文化上的享受,甚至超前



消费。这一类家庭虽然在比例上仍是少数,但若推算数量也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增长的趋势明显。而贫病型和蜗牛型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疗市场化、教育商品化和住房私有化之后给一部分家庭带来的负担,使得一些家庭在医疗、教育或住房上的支出压力限制了其在其他物质和文化生活品质上的追求。对于贫病型和蜗牛型家庭未来在消费上的流动和变化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参 考 文 献

Chai, Joseph C. H. 1992.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1(S):721—749.

Cui, Geng and Qiming Liu. 2000. "Regional Market Segments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 in a Big Emerging Market."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7(1):55—72.

Cui, Geng and Qiming Liu. 2001. "Executive Insights: Emerging Market Segmen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A Study of Urban Consumer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9(1):84—106.

Fan, Chengze Simon. 2002.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in Urban China." pp. 82—97 in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 and identities*, edited by Chua Beng-Huat, London: Routledge.

Fleischer, Friederike. 2007. "'To Choose a House Means to Choose a Lifestyle.' The Consumption of Housing and Class-structuration in Urban China." *City & Society* 19(2):287—311.

Schmitt, Bernd. 1997. "Who is the Chinese Consumer? Segment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5(2): 191—194.

Sun, Tao and Guohua Wu. 2004.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Consumer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21(4):



245—253.

Xie, Yu and Yongai Jin. 2015. "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3):203—229.

Xie, Yu, Xiaobo Zhang, Qi Xu and Chunni Zhang. 2015. "Short-Term Trends in China's Income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Household Surve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5:1—17.

Yin, Xiangdong. 2005. "New Trends of Leisure Consump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1):175—182.

Zhou, Joyce Xin, Mark J. Arnold, Arun Pereira, and Jun Yu. 2010. "Chinese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Styl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Reg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3(1):45—51.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2012,《大消费时代市场新趋势》,《洞察中国》2.27—3.1。

吴垠,2005,《关于中国消费者分群范式(China-Vals)的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2期。

张春泥、涂平,2014,“消费模式”,《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第3章(谢宇、张晓波、李建新、于学军、任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字编辑:杜贵明

校对:李汪洋、喻文姍

